

意外发生

金秋十月，英格兰苏格兰草地碧绿如毯，德国莱茵河两岸百里黄叶；布拉格的大片旧城，让人们感到时光倒流了三百年；古堡、皇宫、教堂的异国风貌，三个袖珍国探奇……它们从画册、电视、电影的画面上下走来，我们则施施然地走进了画面。

行程第36天，11月18日下午，下午二时，车抵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近郊十多公里的大石角。面对浩瀚的大西洋，脚下是三四十米深的悬崖，我的旅伴老朋友赵大伟未曾一脚滑到大西洋去，却在最后一个急急上大巴车时，一脚踩空，头撞到大巴车中门的最上一级台阶金属角条上。闷吭一声，全车都听到。老光眼镜碎了，挂在脖子上的佳能专业相机和红圈变焦镜头从卡口处摔断，镜头滚落在地。前额和鼻梁上撞开二道5厘米长的深裂口，血流满面。

我急急拿出女儿刚从日本带来的粘状液涂敷在他脸面伤口上，此粘液能消毒、止血，稍时便能在伤口上凝成保护膜，隔断空气，待以后轻轻揭下便可。

大巴疾驶里斯本市区，停靠航海家纪念碑。导游罗先生取出一张里斯本地图，招来一辆出租车，要大胡子司机快送就近一家大医院，并标出当晚团队住宿里斯本国际机场近处宾馆。

北京青年

地盘仅比上海黄浦区大不了多少的里斯本市区，下午三时，也是令人焦急的堵车。司机看到大伟越发肿痛的脸，急人所急，几个转弯到一家医院门口问门卫，只见对方摇头，便知此医院或没有或不接诊此类伤者，只好再转他院。可以明显感到大胡子避驰可能堵车的道路，转入几条小马路抄近路。9.5欧元，一刻钟内送到了可以接诊的医院。

下车一看，想必门内有两位穿白大褂的小间窗口便是挂号处，便指着大伟破相血染的脸一番比划。对方的葡萄牙语呀哩胡哩连带摇头，怎么？又不接诊？原来是要求出示护照登记。按要求急急付了一笔20欧元，又一笔116.67欧元，便扶进隔壁小间只有一位医生和护士的初诊处，护士作面部清洗。葡萄牙人微笑着不急不忙的缓慢动作，对比着我和陪护的钱忠海先生亟不可待的无奈表情，只恨不能指挥他们快直送外科缝合。

一刻钟后，大伟坐上轮椅被推入走廊里候诊。又过了一阵，才被推进简易手术室。我掏出那盒伤口保护粘液盒，比划着试图告知医生，在缝合前要先揭下已凝成的透明保护膜，结果是他一句也听不懂。

其实，外科医生们从病历上已知道我们是Chinese，马上叫来一位东方面孔、外形体貌近似刘翔的医生。一问之下，是一位已在这家医院实习了两年的北京青年。真幸运！我们有了专业翻译。

情况不妙

四十分钟后，大伟被推出手术室。正当我们以为可以离去时，北京人告知我们，接下来要做一个CT检查。

怎么？严重到要做CT？原来，大伟在七年前做过心脏搭桥手术，通过这位翻译，他将搭桥的病历“搭”给医生知道了，医生断然拒绝大伟一再诉说感觉尚可、伤口无碍的离去要求。于是，大伟被推到地下一层，躺在轮床上卧等。

这一等就是三刻钟。里斯本的深秋，五点刚过，天已渐黑。等着无事，我仔细观察了这所医院。这是一家有三层地面大楼加地下一层的医院，大伟就医的一楼（西欧称零层），中间是一条宽敞走廊，两侧是几间门诊室、治疗室、简易手术室，一间放着检查仪器类，还



葡萄牙急诊 惊魂记

◆ 王佐融

一行五人，平均年龄66大顺，不谙外语，出游东欧、中欧和西欧15个国家50个城市，全程42天。只是没有想到，我们还会急急走进欧洲医院的急诊室。

本版插图 叶雄



有几间是二张或六张病床的观察室，走廊里也临时放置着二三张轮床、轮椅，躺着坐着待查病人。一位保安守卫里面半条走廊。中间有一道门通向外面的候诊大间，沙发上坐着20来位候诊者，隔壁是一间输液间，多是岁数偏大的患者。

晚上八时CT出来了。北京人打开电脑，指着大脑上方一块有小指甲搬大小的黑块，我一惊：闪出“淤血”两字。他说这不是血块，是空气泡。然后介绍自己是脑外科医生，言下之意他的判断不容置疑。

脑袋里进了空气！马上想到三天后从马德里飞伦敦，飞行两个半小时，空中高度必在8000米以上。北京人一听，眉头一紧，加了一句：可能还有轻微脑震荡，又加上一句：心脏还搭过桥，再加上一句：他已经66岁了！我们一下子被抛进了大西洋的冰水中。

无奈等待

终于，CT医生的诊断出来了：伤者眼眶疑似有骨裂迹象，是否对眼睛有损和以后影响视力，我们医院没有眼科医生，要用救护车送到另一家医院，请眼科专家确诊。现在正在联系对方和救护车。

意外复意外，严重叠严重。忐忑中又过去了半小时，被告知可以出发，但你们两位不能随车，要么打的跟去，要么在这里等他回来。

不能随车？这又是不同于国内的“行规”，只得耐下心来再等吧！我估计，不太大的里斯本市区就算从东郊开到西郊，晚间道路畅通，一路警铃可闯红灯，用不了半个小时来回，加上专家诊断时间，一个小时后，但愿等出一个有惊无险的诊断来。

接下来又是一个“不料”，北京人告诉我，大约要等三个小时。

“怎么会要那么长时间？”

“这还是最快估计，可能还要长些。”

忠海和我坐立不安，在煎熬中踱进踱出。已近九时，就诊者仍众。五辆救护车时进时出，十几辆出租车停在院外候车道上。候诊室里十有八九是年长者；一位轮椅上坐着脚伤的母亲由女儿推进推出，一群男女亲属在安慰着一位双泪眼红的当地中年妇女。我心中闪出一个问号：这家里斯本医院究竟是什么级别的？如果是综合性大医院，怎么没有五官科，好像也不见儿科。与上海的三甲医院比较，他的“规模”远在区级医院之下。我能与之对话的只有那位北京人。

“您是从北京来里斯本学医的吗？”

“不，我父母是北京人，我二岁

时出生在葡萄牙，在家里是说北京话的。”

“哦，您上医科大学是在里斯本？”

“是的，在这个医院实习了二年，还有三年。”

“以中国医院的等级划分，比如最高等级是三级甲等，请问，这家医院属于哪一级？”

“最高等级。”

“最高等级？”

“因为有脑科。”

我还是一知半解，又不便详问。但不谈医院规模大小，我已被他们为求确诊，顶真到不容稍有折扣的“最高等级”的负责态度所折服。尽管心里有点埋怨他们的动作缓慢，节奏欠快，哎！

签证大限

我和忠海站在大门口守候，每当有一辆救护车驶入，便迫认牌照上的数字，一次次失望，直到过了深夜12点。

空静下来，一个担心油然而起。

现在已是11月19日凌晨，既定的行程是：今天早上八时，离开里斯本，下午三时在途中杜丽多古城逗留一个半小时，游览皇宫和教堂后，再行驶一个小时抵马德里。然后，我们一行五人离开旅游团队，在马德里住二晚游览一天，后天上午十一时飞往伦敦，在伦敦逗留两晚一天，再飞香港，转机上海，结束这次42天的长途欧旅。

马德里—伦敦航程两个半小时，伦敦—香港—上海航程又是16个小时——那可是在大西洋和欧亚大陆上8000至10000米的高空呀！升空、下降、减压、增压，老友能挺过来吗？

当然，最好是暂留里斯本复诊、吃药、打针和休养若干天。但是，一个要命的逗留时间限制不容我们随心所欲。

我们此旅欧洲大陆14个申根国，已用去了27天，离开马德里时已是30天限期的最后一天。如果大伟遵医嘱在当地康复到允许登上飞机，则今天一早须赶到我国驻葡萄牙国大使馆，出示就医证明以取得签证延期许可，紧接着是三程机票的改签，当然还要由一位陪同留下照顾。如此一想，已经瞌睡来袭的我，一下子将睡意抛向大西洋上空。

逃离医院

三个小时后，大伟终于回来了。不是从救护车上抬下来，而是招了出租车返回的。

“我是逃回来的。”

原来，眼科专家作详尽检查后，认为眼睛和视力尚未造成重大伤害，但鼻梁受了不轻的撞伤，有明显的伤痕，须等明天上午再由鼻腔医生诊查下结论。

既然未造成眼伤，而鼻梁是软骨组织，大伟自觉无甚大碍——人都是这样，此刻此时，往往向好的方面判定多些，或是出于自慰，或是出于减轻他人的担心。大伟用手势、表情加上中国话比划了半天，眼科专家则是用葡萄牙语呀呀呀地说服不了这位伤者。他俩的牛头不对马嘴引来了一位也在这里就诊的浙江姑娘（欧洲大地上的中国人真多哇！），她同情这位老同胞的不幸，劝说眼科专家“放手”，最后，医生“违心”地收回了成命，请护士联系救护车。大伟已等不了了，立马招了一辆出租车，“逃”了回来。

此时，已是凌晨十二时半。

日班医生护士们已下班，临时翻译北京人也已离去。我们三人在外科找到了一位八字胡子的老医生，他一再说是对面座位上的医生

接手这件事。语言不通的我们上下内外转了20来分钟，却未找到这位需落笔书写最终诊断结论和开药的医生。时不我待，大伟的意思是：走吧！忠海先生说：我带了头泡，可消灭。

“你那脑袋里的空气泡？”

“不碍事。”大伟解释说，“那是1999年查出过的脂肪瘤，后来未长大过。”

“那么，脑震荡有结论吗？”

“他们的检查一丝不苟，我理解：不提就是没有脑震荡。”大伟给我们一个故作轻松的表情。

那么，还有一桩未了之事。CT检查费、救护车费、眼科转诊费还未付过。再等，已经耗不起了！我们搀扶着大伟上了出租车。葡萄牙的天空繁星点点，里斯本已经沉睡了。我们回头向静谧下来的这家异国最高级别的医院悄悄告别，向这里的医生、护士、救护车员工，向北京人“刘翔”致谢！感谢他们名至实归的“至诚”服务。

提心吊胆

驰向马德里的675公里长途，疼痛中的大伟想得很多，我们四人也想得很多。我们必须想出一个对付万一的“预案”来。

如果马德里机场方看到大伟肿胀变形的脸和需人扶助的病态，被要求出示医生证明，遭到拒乘，怎么办？“预案”是：原计划中大伟将与一位老友在马德里定居的妹妹见面，有劳这位同胞陪送机场过“安”检。不然，就在马德里即购欧洲快铁火车票，赶赴伦敦上飞机；如果今天汽车长途上大感不适，就只能留住马德里。这样，明天便要先到中国驻马德里大使馆办签证延期手续。

大伟在马德里静养42个小时后，顺利登机。但2个小时大西洋空中的航程却大不好受，特别是起飞和降落过程，他胸闷到几乎呼吸关闭，头疼到似乎伤口崩裂。

在伦敦当晚，我们各自挖掘有限的伤、医知识，讨论和判断返途万一出现迫降某个城市，对大伟施以急救……真是不敢推想下去。

要不要在伦敦检查一次？

还有，大伟受伤事件尚未告知其家人——国人多是如此，所闻报喜不报忧吧！但是，如果出一个“万一”，家人责问起来，又将如何交代？

还是听听当事人的意见吧。

大伟感觉三天下来疼痛在减轻，面额肿胀也在消退中。如果踏进伦敦诊所，医生多会要求滞留伦敦。至于家人，大伟仍然拒绝告知。一位曾在美国芝加哥从事护理的华人退休护士长提供的意见是：CT检查未查出气泡和脑震荡是好消息，疼痛还要继续几天，不过安全性还是偏高。

11月23日晚，大伟的里斯本“事件”五天又五个小时后，我们一行五人在希思罗国际机场登上香港国泰航空的宽体大飞机。

24日晚八时，“66”大顺顺利返国，大伟平安走出浦东国际机场。

那么，我们一路上念念不忘的里斯本医院还有一笔治疗和救护车费用欠账，怎么办？当天在离开里斯本时，我们就委托导游罗先生一定要和院方联系，但他将在下周开始休假期春节前。

在伦敦机场候机室，巧遇一位30多年前移居巴西的上海人老华侨。他每年到里斯本女儿这里探亲，据他讲，你支付了门诊费后，不必再付。

为得到确切回复，12月4日下午，我走访了威海路上的葡萄牙驻上海领事馆，对方一挥手：不需要，我们福利好，你已付过了，可以了。

还有一个后续消息是：大伟在拆线时，医生惊讶地告诉他：你面额上这种缝合细线，我们是用在心脏手术缝合上的，每根要100元！